

中国古典小说在匈牙利的翻译

◎ [匈牙利] 彼得·海居 著

◎ 陈广兴 译

摘要：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时期是文学翻译的黄金时代，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保证了古典文学翻译需要的人员和资金。巴纳巴斯·琼格尔(Barnabás Csongor)1961年翻译出版了《水浒传》，1969年翻译出版了《西游记》，这两部书均直接译自汉语。而1959年出版的《红楼梦》和1964年出版的《金瓶梅》的匈牙利语译本均译自德语节译本。《三国演义》迄今只有六章被翻译为匈牙利语。在过去二十年里，匈牙利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趣在消退，中国古典小说在市场经济的匈牙利很难引起关注。

关键词：中国古典小说；翻译；匈牙利

社会主义时期似乎是文学翻译的黄金时代，匈牙利的小说翻译尤其如此(Simon, 1999: 26)。这段黄金时期不包括比较严格的斯大林主义进行统治的最初几年，那几年不仅禁止任何翻译和出版，同时还禁止阅读那些生活在或曾经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作家的作品。有六年左右的时间，极端的审查制度实际上让匈牙利的文化活动几近于无。然而，大约从1954年起，或肯定地说，从1956年至1990年，领导者极力资助社会主义文化启蒙项目。翻译作品被当作教育民众的一种手段。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导向的活动，在国家的资助下，由出版社将世界文学的重要作品（那些被认为未明显包含不良意识形态的作品）翻译出来，让劳动人民能够阅读。他们拥有时间、人员和资金来做这件事。因为出版社不是市场导向的，所以他们能够在一个项目上投入几年时间，而不期待快速的经济回报，甚至根本不期待经济回报。他们得以拥有相对可靠的编辑和校对人员，因为政治排查对一些相对基层的知识分子来说并不是那样严酷。出版社也拥有资金，翻译的报酬相对较高。当然是相对而言，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收入普遍都很低的年代。

在翻译人才方面，情况也比较有利（至少从翻译角度而言）。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家被共产党列为可疑分子。这些作家很少被允许发表自己的作品，或从事与写作有关的工作。但他们获准靠翻译来谋生。格

察·奥特里克(Géza Ottlik)，现代匈牙利重要作家，被迫学习英语来翻译狄更斯，因为这是唯一能让他避免饿死的工作(Ottlik, 1980: 257-260)。其结果是，我们拥有了用最好的现代匈牙利语言写成的狄更斯上乘译作。我必须承认，很多学者认为奥特里克的翻译往往有欠准确，这毫不奇怪，因为他在翻译狄更斯的同时正在学英语，也有人怀疑真正的译者是奥特里克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懂英语。不管何种情况，从翻译的目标语导向观点来说，这些都是很好的翻译，因为目标文本的品质很高。

奥特里克绝非个例。很多重要的匈牙利学者都倾向于翻译而非写作，因为翻译更加安全。出版社的代表人士为选择翻译和出版的图书而承担风险。翻译者仅需尽其所能做好翻译，然后拿钱。发表文章或学术专著将冒更大的风险，作者很可能因为其观点而成为政治斗争的对象，而不会对自身带来任何好处，而且人们不需要通过发表研究成果来保住自己的工作。整个东欧的情况均是如此，研究经典的学者在社会主义时期很少出版著作，但翻译很多。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翻译黄金时期的第三个方面：匈牙利科学院的影响，以及人文学科或整个学术界的影响。科学院自然也同出版社一道，制定了有关翻译内容的计划。这些书单包括社会主义版本的世界文学经典，学者必须在书单中加入挑选理由以说服当局。一旦书单通过，一部文

学作品便很可能便具备了进行翻译的所有条件：一个好的译者、时间、资金和编辑队伍。

尽管如今译者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不利的变化，但翻译在当今的东欧依然拥有崇高的声誉，考虑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情况，这种情形完全可以理解。我们没必要担心总体规划中没有了翻译，因为规划的存在也意味着没有进入规划的作品很可能被当作禁书。但现在国有出版社已经不复存在，而商业性企业总是尽力压低成本（付给翻译者更低的报酬，不愿雇佣文本编辑），尽快获取利润（迫使译者在很短时间内完工）。优秀的知识分子很可能在从事更好的职业，更乐于撰写自己的著作，但翻译市场上依然有很多优秀的译者——他们同那些速度更快、能力缺乏但便宜的译者进行激烈的竞争。佩特拉·吉塞拉·萨博（Petra Gizella Szabó）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是一名优秀的译者，把德语翻译成为匈牙利语，或把匈牙利语翻译成为德语。她的译本质量极高，但她翻译仔细，速度缓慢。1990年后的出版社都不能容忍她的速度，她实际上无法靠翻译谋生；而在此前基本上还能够靠翻译糊口。

这些变化给那些真正需要长时间进行翻译的文学作品——如史诗和鸿篇巨制的小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学者们经常表达对重要经典诗作或大部头小说的新译本的渴望，而这些作品的翻译往往需要多年时间，在此期间没有人会付给译者一分钱。谁有条件去这样做？花多年时间从事一个翻译项目，而同时要通过其他途径挣钱养家？这里我想举一个反例，茹饶·拉科夫斯基（Zsuzsa Rakovszky）是一名优秀的诗人，在其职业晚期转变成为一个优秀的散文作家。1986年以来，她以翻译英国作品为生。2008—2009年，她翻译了斯蒂芬妮·梅尔（Stephanie Meyer）的《暮光之城》三部曲（*Twilight*）。一方面，她能够快速翻译，因为这个英语文本相当平实简单，然后拿钱；另一方面，她的译作文笔远好于源文本，因为尽管译速很快，但一位一流的散文家必然会重写一本畅销书。或许这一切都可以归因于文学翻译依然享有的崇高声誉和自由市场的生存压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禁为人才的浪费而扼腕叹息：一个优秀的作家，在翻译时本应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一流的作品之中。

以上的背景介绍将有助于解释中国古典小说在匈牙利的翻译情况。因为这些古典小说都很长，在今天的匈牙利似乎没有得到翻译的可能，而社会主义时期的出版社将其列入计划，将其翻译出版，让劳动人民能够阅读，则完全在情理之中，因为中国古典小说

也属于世界文学经典。一位重要的匈牙利汉学家巴纳斯·琼格尔（Barnabás Csongor）翻译了四大名著中的两部，即1961年出版的《水浒传》和1969年出版的《西游记》（Si, 1961；Vu 1969）。我们可以说曾经是一个重要的汉学家，是因为他曾在布达佩斯担任匈牙利唯一的汉语系主任长达20年（1963—1983）。他发表过重要的文章，但从未出版过专著。正如我刚刚对社会主义时期东欧知识分子的独特成就所进行的介绍，或许他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他的翻译。他也会翻译过中国诗歌和一些次要的小说作品，但两个如此巨大的翻译工程已经足以让我们对他心生敬意。而且事实上在这些小说出版时，他并未在学术上对其予以关注。1977年《水浒传》第二版标明为“扩展版”（Si, 1977），然而第一版并未在任何地方标明是删节版。第一版以两卷出版，第二版以三卷出版，这并不能说明第二版就比第一版更长。他同时对附录的文章进行了修改：第一版含有一篇题为“关于《水浒传》”的前言，而第二版则含有一篇题为“中国小说——中国社会”的后记。在1980年第二版的《西游记》中，他不仅写有一篇评论（Vu, 1980），而且增加了董说的《西游记补》（Tung, 1980），由于同样的版式和设计，新增的《西游记补》很像是小说的第三卷。除此以外，琼格尔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几乎完全停止了翻译工作。

这些由了解中国语言文化的专家所做的优秀的、可靠的、完整的翻译（用略带优雅的古语），完全满足了匈牙利关于文学翻译经典化的一般标准。其余的中国古典小说就没有碰到这样的好运气。《红楼梦》和《金瓶梅》都译自德语节译本。前者译自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1932年的译本，而此译本所含内容几乎不及原作的一半。匈牙利语版本共出版5次（1959, 1962, 1964, 1975, 1988），其中的一版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出版，为生活在那里的150万匈牙利少数裔提供了一部优秀的中国小说。1983年匈牙利科学院和布达佩斯大学组织了一个名为“中国文化在匈牙利”的汉学研讨会，并展出了一些书籍。发表的会议记录收有玛利亚·费伦奇（Mária Ferenczy）的一篇文章，描述了这次书展。费伦奇觉得有必要解释为什么一些并非直接译自汉语的书籍也被展出。公众对一些中国古典小说如此感兴趣，“很有必要在直接译自原著的翻译面世之前，让它们尽快与读者见面。这样做很有必要，例如《红楼梦》至少已经卖出了四版，而直接源自汉语的翻译目前尚处于准备阶段”（Ferenczy, 1985：84）。这个“准备阶段”估计仅仅

是有人在讨论如果能够直接从汉语翻译该有多好。然而直接译自汉语的事并没有发生,5年后同一旧版本被再版,自从1988年以来,《红楼梦》既没有得到重译,也没有再版过。我明白翻译一个删节本要快很多,但费伦奇似乎认为从汉语翻译比从德语翻译往往更慢。如果一个汉学家这样说,我们就很难辩驳,但我们依然心存疑惑。我发现这句话似乎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学术型译者的翻译(因为更加仔细)比职业翻译者更慢。

《金瓶梅》同样译自弗朗茨·库恩的德语译本,该版本经过删节和色情内容的淡化处理,命名为 *KinPingMeh, oder Dieabenteuerliche Geschichte von HsiMen und Seinen sechs Frauen*, 德语副标题的意思是“西门及其六个妻子的冒险故事”,对小说内容进行了解释,这也是1939年伯纳德·麦阿尔(Bernard Miall)的英译本的标题,该译本也译自库恩的版本。这个德译本还在1949年被译为法语。让我来总结一下当时的情形:当匈牙利出版社决定出版匈牙利语的《金瓶梅》时,整个欧洲的普遍倾向是拿弗朗茨·库恩的译本作为源文本。如果他们没有一个可以从汉语进行翻译的人才(因为唯一合适的人选正在翻译《西游记》),那么就不可能真正产生一个西方的全译本。第一个德语的全译本的第五卷直到1983年才得以出版,而法语全译本发表于1985年。虽然有一个出版于1939年的英语全译本 *The Golden Lotus*, 但其中比较露骨的性描写被翻译为拉丁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净化处理(Egerton, 1939)。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英语全译本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出版于2006年(Roy, 2006)。因此,1964年第一个匈牙利译本译自弗朗茨·库恩的译本还是相对容易接受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没有人尝试从汉语原文翻译出全文。这种兴趣的缺乏很可能是由第一个译本的巨大成功所导致,该译本被5个出版社在两个国家出版过7版。这是1990年之后被重新出版的唯一的中国古典小说。此前,1984年,布达佩斯最大的一家剧院上演了由该小说改编的戏剧,一个由该小说改编的广播剧播放达数月之久。

在结语之前,我们再简要地介绍一下《三国演义》的情况。有迹象显示,欧洲出版社(Publishing House Európa)有意出版译自汉语原作的《三国演义》全译本。这家出版社负责出版匈牙利语的世界文学的出版,尽管该出版社于1957年命名为欧洲出版社,但其出版活动并不限于欧洲甚或西方。它曾出版过品质极高的系列丛书,例如“世界文学经典”丛书就试图

囊括所有的世界文学经典,“现代图书馆”丛书从五大洲挑选当代作家进行出版。或许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费伦茨·杜克义(Ferenc Tőkei),一位颇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也是一位忠实的(曾经一度也是位高权重的)共产党员,因为1956年之后他与社会主义党在政见上产生隙隙,而被东亚博物馆开除,转而在1957—1967年间为欧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他似乎曾经促使欧洲出版社出版所有的中国古典小说。20世纪60年代晚期,一位年轻的汉学家伊尔迪克·埃克西迪(Ildikó Ecsedy)提交了一个翻译样本,让出版社决定是否要出版《三国演义》。她翻译了前六章的内容,大约占全书的5%,但出版社没有通过这个翻译项目。《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古典小说中唯一没有被欧洲出版社以任何形式出版的。伊尔迪克·埃克西迪并没有继续翻译下去。1987年她出版了前六章的翻译,在“译者按”中,她说:“大约在20年前,我在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自认为应该在承担其他义务的同时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翻译项目,我想将全文都翻译过来。”她认为在1969—1970的转折时期“或许是地缘政治情形部分地导致了出版社对我的翻译建议的拒绝。”(Ecsedy, 1987: 76)她的翻译由匈牙利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讲习班出版,当时她就在这个研究机构中工作。她的翻译是学术型翻译,其目标读者不是普通大众。1997年另外一家重要的学术出版社巴拉斯(Balassi)再版了这部分翻译。我们发现一个年轻学者的翻译片段(当初的目的是面向广大的普通读者)在她的事业和影响力达到巅峰的时候会被当作其学术成就而重新引起重视。将此翻译视为学术成就的另外一个体现就是,两次出版都没有在封面上注明原作者,而仅注明了译者。这种情形在匈牙利出版业中非常罕见,通常是作者出现在封面,而译者则没有。在埃克西迪的翻译中,作者的名字仅在第三页以副标题的形式出现:《三国演义:罗贯中小说中的前六章》(Lo Kuan-Csung, 1987: 3)。

从出版和销售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匈牙利民众对直接译自德语、间接译自汉语的中国古典小说的短版本更感兴趣。为何如此?或许是小说中描写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匈牙利现实社会的巨大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让匈牙利读者望而却步,而译自德语的版本经过双重的归化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弗朗茨·库恩使欧洲读者能够阅读中国小说,不仅是将其转化为欧洲的一大语言,而且通过大量的删减,让其符合欧洲读者对小说的阅读期待。匈牙利的翻译者并不懂汉语,他们进一步把文本归化,丝毫没有重新将其汉化的想法。或许

《红楼梦》和《金瓶梅》本来就比较接近西方小说（毕竟都是在讲述家庭故事，同时具有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这种相似性又经过了德语译本的进一步强化。

但归化并不能解释所有情况。据说费伦茨·杜克义曾校对过《金瓶梅》的翻译，他也曾为《红楼梦》和《金瓶梅》撰写过阐释文章。匈牙利译本似乎并没有真正地归化陌生的内容。且列举两例。匈牙利语的《红楼梦》译本沿用了汉语的称呼，如 *taimai*（太太）和 *meimei*（妹妹），并在小说最开始对这些汉语称呼进行了简要的解释。第二个非归化策略的例子是《金瓶梅》的标题。匈牙利语的翻译没有重复弗朗茨·库恩的正副标题，而是直接对汉语原标题的隐喻进行了解释：“富有之家的漂亮女人们”。虽然通过解释可以让人明白原由，但这样的语句作为小说标题，在西方或匈牙利背景下绝对显得非常怪异。虽然该小说经过了两次转译，文本还是更接近于重构原文，而非采取归化翻译策略。而且尽管弗朗茨·库恩的译本被认为经过了含蓄处理，删减了多处露骨的色情描写，但它依然包含大量的色情场景，大多以高度隐喻化的语言呈现，而这些隐喻在西方或匈牙利文学传统中并不存在。这也能够成为它受欢迎的原因：色情书籍在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是严格禁止的，但需求很可能还是存在的。一些世界文学经典能够提供某种替代物。尽管

翻译被“净化处理”了，但其高度隐喻性的色情语言还是可以释放读者的幻想。一些古典文学作品，包括一些东方的性爱教程，如古代印度的《爱经》（*Kama Sutra*）、奈夫苏义（Nefzawi）的《飘香的花园》（*The Perfumed Garden*），出版的次数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些作品的经典地位，以及它们成书于古代异域文化的事实，都让当局能够接受这些作品，而同时它们也适用于那些不是非常经典的阅读行为。

我们已经说过，在过去的20年里，匈牙利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趣在消退。我也必须提一句，中国近年来的两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匈牙利的文学市场仅仅是非常边缘的存在。只有高行健的小说《灵山》（Gao, 2008）出现在匈牙利的图书市场上。莫言的作品在2013年之前从未在匈牙利出版，现在出版了《酒国》（Mo, 2013），译者伊娃·卡尔马（Éva Kalmár）出生于1938年，其职业更多地与出版行业紧密相连，而不是学术圈。然而，我所盼望的是匈牙利新一代汉语译者的崛起。1990年左右约有3万名中国人移民匈牙利，当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已经获准离开中国，而在入境匈牙利时尚无需护照。他们的子女，即出生在匈牙利的第一代华裔匈牙利人，在双语环境中接受了教育，现在差不多要从大学毕业了。□

参考文献

- [1] CAO Hszüe-csin. A vörös szoba álma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Vols 1-2) [M]. GYÖRGY L (trans.). Budapest: Európa, 1959.
- [2] ECSEDY I. A fordító megjegyzései (The Translator's Notes)[M]// LUO Kuan-Csing. A három királyság története (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Budapest: MTA Orientalisztikai Munkaközösség, 1987:76-77.
- [3] EGERTON C. The Golden Lotus[M]. London: Routledge, 1939.
- [4] FERENCZY M. Kína kultúrája magyarul: Válogatás az utolsó harmincöt év könyvterméséből (China's Culture in Hungarian Translation)[M]// FERENCZY M. Kína kultúrája Magyarországon (China's Culture in Hungary). Budapest: MTA Orientalisztikai Munkaközösség, 1985:83-95.
- [5] FRANZ K. Kin Ping Meh, oder Die abenteuerliche Geschichte von Hsi Men und Seinen sechs Frauen[M]. Leipzig: Insel, 1930.
- [6] GAO Xingjian. Lélek-hegy (Soul Mountain) [M]. KISS M (trans.). Budapest: Noran, 2008.
- [7] KIBAT O, KIBAT A. Djin Ping Meh (Vols. 1-5) [M]. Berlin: Ullstein, 1967-1983.
- [8] LÉVY A. Jin Ping Mei (Vols. 1-2) [M]. Paris: Gallimard, 1985.
- [9] LO Kuan-Csing. A három királyság története (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M]. Budapest: MTA Orientalisztikai Munkaközösség, 1987.
- [10] MIALB B. Chin Ping Mei; The Adventurous History of Hsi Men and His Six Wives[M]. London: John Lane, 1939.
- [11] MO Yan. Szeszöld (The republic of wine)[M]. KALMÁR E (trans.). Budapest: Noran, 2008.
- [12] OTTLIK G. Próza (Prose)[M]. 2nd Edition. Budapest: Magvető, 1980.
- [13] ROY D T.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M].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6.
- [14] SI Naj-en. Vízparti történet (Water margin) (Vols 1-2) [M]. CSONGOR B (trans.). Budapest: Európa, 1961.
- [15] SI Naj-en. Vízparti történet (Water Margin) (Vols 1-3) [M]. 2nd Extended Edition. CSONGOR B (trans.). Budapest: Európa, 1977.
- [16] SIMON R. Az első hiteles magyar Ezeregyéjszaka története az európai recepció tükrében (History of the First Reliable Hungarian One Thousand Night and a Night in the Context of the European Reception) [M]// PRILESZKY C. Az Ezeregyéjszaka meséi (One Thousand Night and a Night) (Vol. 1). Budapest: Atlantis, 1999: 7-31.
- [17] TAMÁS M. Szép asszonyok egy gazdag házban (Jin Ping Mei)[M]. Budapest: Európa, 1964.
- [18] TUNG Jü. Ami a Nyugati utazásból kimaradt (A Supplement to the Journey to the West)[M]. CSONGOR B (trans.). Budapest: Európa, 1980.
- [19] VU Cseng-en. Nyugati utazás avagy a majomkirály története (Journey to the West or The monkey king) (Vols 1-2) [M]. CSONGOR B (trans.). Budapest: Európa, 1969.
- [20] VU Cseng-en. Nyugati utazás avagy a majomkirály története (Journey to the West or The monkey king) (Vols 1-2) [M]. 2nd Edition. CSONGOR B (trans.). Budapest: Európa, 1980.

◎ 彼得·海居 (Péter Hajdu)
匈牙利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pethajdu@gmail.com

◎ 陈广兴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gxccarl@126.com